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一七期 ——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9d)

【亡灵祭坛】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杨银波
【千秋功罪】	王佩英第二次平反的意义	王友琴
【史海钩沉】	周恩来为何会拥护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王洪文？	孙言诚
【口述历史】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下）	唐欣·米鹤都·墨诞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 杨银波 •

◇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见本刊 zk1007b——编者），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被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

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

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

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跣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会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 原载《民主中国》2011年8月5日

~~~~~

## 【千秋功罪】

### 王佩英第二次平反的意义

• 王友琴 •

在文字写作中，历史写作可能最有长远意义，而司法判决书可能最具权力。本文则想从历史方面说明一个司法判决书的意义。

这份今年六月九日的判决书给王佩英作了第二次平反，宣告她“无罪”。谁是王佩英？两年前《开放杂志》在清明节的四月号上发表了 my 文章《清明节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她生于一九一五年，北京铁道部设计院幼儿园职工，开封人，毕业于开封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这所学校在一九四九年后搬往台湾，后成为现在的静宜大学）。她育有七名子女，丈夫在一九六〇年病故。一九六三年，她写信写诗批评毛泽东，因为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数千万中国人因毛的荒谬残酷的农业政策而饿死。

#### ◇ 王佩英批评毛泽东文革中被处死

当时广大干部都不敢批评违抗毛，而王佩英发出了她的声音。文革前的政策，显然没有文革开始后的政策残酷。她被送进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在北京郊区回龙观的一个地方关押起来。文革中一九六八年，安定医院把王佩英赶出了“疗养院”送到原工作单位。安定医院的信上说，王佩英不是精神病，而是反革命。很清楚，在文革前用“精神病”对付有不同思想的人，文革时，用“反革命”罪名和监狱甚至死刑来迫害有不同思想的人。

一九六八年文革中得到毛泽东直接指示最多、害死人数量最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在进行。在单位的“牛棚”中，王佩英告诉和她关在一起的两名女干部和一名女翻译，她不会沉默和停止反抗。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单位食堂午饭时，她当众喊出了反对文革和“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立即遭到毒打并被押送公安局（当时在军事管制中）的拘留所。

一年以后，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活动”。她被列在一份二十人的材料中，在北京全市各工作单位交“群众讨论”是否应该判死刑。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她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前的死刑会有上诉期，一九七〇年毛泽东批准“照办”的文件中规定了“立即执行”的新政策）。

我的文章标题原是“一位梳辫子的母亲”，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王佩英的照片上，她梳着长辫子。她的辫子给人年代感，因为后来的中国女性中已经少见这样的发式；她的辫子也代表着她的女性和母亲的身份，显示着她的温婉和平，对这样一个人判处死刑无法让人接受或者想像。发表的时候，金钟编辑把标题改成了“英雄母亲”。我理解，杂志文章标题应该直白明确，含蓄却不见得合适。而称她为英雄也是我文章的原意。

#### ◇ 文革受难者和英雄是两个概念

我说的英雄，是指的那些为真理和正义而主动采取行动的人，具体到文革，首先是那些为千千万万受难者进行抗争的人。我在文革写作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写了文革受难者。“受难者”和“英雄”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文革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被迫害死了。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反对毛泽东以及他的统治理念，但是文革攻击迫害他们，乃至剥夺他们的生命。现在有人把文革运动的主体事件描述成文革的拥戴者和反对者的斗争，不符合实际情况。

文革中反抗英雄极为稀少，最为明显的原因是文革对人的迫害前所未有的严酷和残忍。而王佩英，就是这极为稀少的英雄中的一位。在我看来，写作历史首先是为了记载事实，从这个方面说，记载千万被害死而且有意无意不被记录的受难者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历史写作也是为了彰显正义和道德，书写英雄正是为了激励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坚持道德追求。后人阅读历史，那些过去时代的英雄，有如夜空中闪亮的星辰，指引着后代人的人生路程。

#### ◇ 死刑判决书没有具体的罪状

王佩英在一九七〇年被判处死刑。在当时的判决书中，她的“罪状”，主要就是散发“反动传单”和呼喊“反动口号”。但是当时的判决书并没有告诉这些传单到底写了甚么，也没有告诉她喊了甚么“反动口号”。判决书避免提到她反对导致饥荒的残酷农业政策，也避免提到她喊了“打倒毛泽东”。

显然，文革当局不愿意传播这些思想。他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处以重刑，并且把这种重刑广泛告知所有的普通百姓，但是不说明这些人的思想是甚么。文革当局发明了一个专门术语，叫做“防扩散材料”（这个术语听起来是甚么人苦心设计出来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研究）。

判处王佩英死刑，判决材料先在各单位先组织讨论，然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北京最大的集会场所，可容纳十万人）召开判决大会，然后把判决书张贴在全城（虽然没有给家属一份），他们的用意很清楚，他们需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制造恐怖气氛和政治高压，震慑全体人民，保证任何批评和反抗无从发生。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两年后，新的中国当局开始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进行“平反”。得到平反的人，数以千万计。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只有一九五六年在苏联赫鲁晓夫给斯大林大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平反可以与之相比。这首先是因为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两次迫害在性质方面和规模方面可以相比。（现在互联网上就可以看到苏联一百三十万四千五百七十九十六名受难者名字和小传。是俄国人权组织努力的结果。）

#### ◇ 一九八〇年平反：延续愚民政策

王佩英在一九八〇年得到平反。然而，这个平反书中说她有精神病，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第一次平反书的隐含意思是，如果她没有精神病，那么她还是得负刑事责任。

第一次平反书的这种说法，正是当时的关于“平反”的“冤假错案”理论导致的。那个理论的意思是，定罪标准仍然是对的，只是没有用对这些标准，所以给予平反。实际上领导了这个大规模平反的邓小平和胡耀邦并不真信这个“平反理论”。“冤假错案”是平常年代也会发生的，需要一件件甄别。

文革后的平反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而且都在短期内一起完成，尽管当时也遇到来自文革驱动力量的很大阻力。“冤假错案”理论的发生有里外各种原因。从好的方面说，是减少社会剧烈转变时可能发生的脱轨意外，使得转变顺利进行。从坏的方面说，这是愚民政策的延续。而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关于迫害的事实描述以及原因分析不被允许进行。

到了文革发动四十年后，一些文革时代被文革当局认可的“英雄”活跃起来，或者否认已经被揭示的大批受难者的存在，或者攻击说出历史真相的作者，或者为他们自己辩护和缅怀他们的风云岁月，一时似乎很成气候。普通的文革经历者们了解这些人是在历史的错误一方，但是也是无可奈何。

#### ◇ 第二次平反：宣告王佩英无罪

幸运的是，在历史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些正直、仁义的人在工作着，致力于阐明真相和坚持正义。二〇一〇年三月，在北京举行了王佩英烈士纪念会，隆重而严肃，数百人参加了这个纪念会。北京学者郭宇宽为王佩英写了一本传记，篇幅不长，但是清晰切实，语言准确，措词得体，是当代传记中的优秀者。这本书没有能出版，但是印行流传。

独立制片人胡杰、胡敏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从王佩英的儿子的视角），影片故事清楚流畅，朴实动人，对观众有很强的感染力。这部电影也在流传，只是不能上市场放映。另外，一个不那么广泛而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听的工作成果，是这份第二次平反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引用了一九七〇年的死刑判决和一九八〇年的第一次平反，然后从诉讼法方面对这次审判作了说明。第二次判决的结论是八个字：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只是宣告“无罪”。对一名被发送传单批评当局政策和文革的人，对一名确实当众呼喊“打倒毛泽东”的人，宣告无罪。至于王佩英是否有精神病？王佩英是否呼喊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王佩英所写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前后的经济政策以及关于文革的传单的内容是否正确？这些都不予置评。为甚么？就是因为这些都与有罪还是无罪不相干。不相干的事情就不必予以论述和判决。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杀了人或者伤了人，而被告可以被证实有精神病，那么被告可以被判决

不负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是否有精神病的辩论才是必要的。如果被告的罪名是别人都穿黑的蓝的衣服的时候，她却穿了一件色泽鲜艳明亮的衣服，法庭当然不需要过问是否精神病人，就应该判决无罪。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偷了东西，那么法庭需要看是否有证据。如果一个人被控告的只是在公园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并唱了歌，法庭当然不必过问被告是否去了公园和唱了几首歌，就应该判决无罪。

#### ◇ 改判无罪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二〇一〇年，在王佩英纪念会上作主题发言的人，是茅于軾老先生。他八十岁，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学工程出身。他的发言，勇敢直率，逻辑清楚，观点明白，语言晓畅（在这一点上就和那些为文革辩护者的曲里拐弯故弄玄虚的文风形成对比）。他赞扬了王佩英生前的所作所为，他也指出文革领导人“有罪”。今年春天，他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明他对毛泽东所犯罪恶的看法。

阅读茅于軾先生的书和文章，我曾经想到，他的上辈人，为中国的现代工程技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父亲是著名铁道工程师，他的伯父茅以升在一九三〇年代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工程界的传奇人物。）今天他要为中国现代法制和经济制度的建设做出他的另一种贡献。有一帮人（据说有五万）在网上发动要起诉茅于軾先生。他们至今不懂或者是故意装不懂，他们不能把指出“毛泽东有罪”来给一个人定罪了。

当然，想要用文革时代的法律，那曾经杀害了王佩英和至今不知其数的中国人的生命的法律，来加害于茅老先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于是这一背景也凸现出这争取来的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的重要性。

王佩英的“反动传单”或者“反动口号”都与“有罪”“无罪”不相关，所以不需要找特殊原因来辩护，也不需要进行事实核对。这是定罪标准的修改。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是重大的区别。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重要的改变。从现实的角度，司法判决书的力量不但在于有执法力量将其转换成实际行动，而且司法判决也不仅针对个别案子而且关系到所有同类的案例，因为在理论上说，法律应该对一切人平等适用。希望如此。

如果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会对其他案例发生影响，那么这是参与这一判决书形成的人们的贡献，也是王佩英母亲牺牲四十三年后，带给当下的中国人的宝贵礼物。我们应该感激她。

□ 原载香港《开放》2011年9月号

~~~~~

【史海钩沉】

周恩来为何会拥护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王洪文？

• 孙言诚 •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

◇ 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我们还是读读《汲郑列传》：

始（汲）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夤缘攀附的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薪式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经历了这场生死磨难，周恩来倒真该看看《汲郑列传》的结语：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韦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其实，君王和宰相抵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

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箏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晋书·桓伊传》载：

奴既吹笛，（桓）伊便抚箏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声慷慨激越、悲壮苍凉，直唱得谢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桓伊传》，用心良苦呵！

◇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王”。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 原载“人民网”2011-08-08

~~~~~

## 【口述历史】

###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下）

采写：唐欣、米鹤都·编辑：墨诞、米鹤都

（上接 z k 1 1 0 9 b）

#### ◇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年10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安置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们有安置费了，住房也在知青点给我们解决了，然后，再把我们分到放牧小组，就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有时候回知青点来换个衣服，取个东西，但不会在那里长住。老乡特热情，把我们看成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里也有两派，这跟家族渊源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了。我们从来没站到哪一派方面去，可能在私交上，跟这边亲近点、好点，那边可能交往少点。翻过来、调过去的，

说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挺复杂的。

#### ◇ 草原之寒（略）

#### ◇ 牧区生活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这一点和农区知青点不一样，农区知青点就是给他们安置费，可以盖房子，配上家具配上必需品，住在一起，每天下地。牧区是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羊、一群牛。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还有的是放马的，但队里只有两群马。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里，我放过羊、放过牛、还打过井、种过菜、种过莜麦、垒过羊圈，除了放马没干过，其他的活都干过。放马需要能人，我们中间只有冯江华放过马。

我们开会、学习、念文件，都是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念不了文件，都是我们来念。不过我只会讲，不会念，现在都忘了，讲不出来了。

那时队里评工分，基本上跟评先进分子似的，很左的。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的工分就高，而不是考虑多劳多得，很多老实疙瘩都给评得高。不过，我们知青没挨着饿，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种莜麦是当饲料用的，每年都发粮票买面，所以粮食不缺。钱是按工分发的，我第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了，除去买点零食、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我在生活上不用家里任何补贴。当时，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都没啥钱。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到井冈山、黄山走了一趟呢。当然，也要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邮寄回来两人用，要不预算也不够。

我们家当时也没钱，父母的工资也都被扣发了。每次我回北京，还让我给家里带肉、带黄油。大概是插队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记得那时我爸爸刚放出来不久，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看着，他边做边问我在内蒙的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做菜只有这么一小碗的肉末。我想，在内蒙都是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也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我爸爸把那肉末炒好了，把大部分搁一个碗里，放到柜子里头留到下顿吃，剩下一点肉末来炒豆角。我想，完了，这么点儿怎么够吃啊。

（下略）

#### ◇ 启蒙与反思

到内蒙之后，我觉得北京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没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不能生存了。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精神状态挺好。说真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就没想到以后还能回北京。我当时也遇到很多涉及前途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基干民兵，有卡宾枪，短的那种，枪长了背着上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的时候，都是背着枪的，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去搞专案。有一天，盟里负责搞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学校去外调我们，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不能干这事。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回到队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和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我觉得看些书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时候，书也很难搞到，图书馆根本不往外借书。还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就通过她把书硬是借出来了。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样几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是认真读的，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里面的一些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这本书以前，我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感觉，看过以后很震撼。再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别和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是当时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还读了屠格涅夫写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都特别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是很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那时候，我们对中国出现的动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对毛主席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和刘进、三友已经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她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是直接质疑毛。那已经是很大胆的了，我们都表示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后，就想读马列的书，是想看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说的做的。当时读马列的书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还没那么多，后来，各队的知青都有跑到我们这里来住上两天的，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进行交流。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候写了几封信，我在信里写，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我写出来就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大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看形势不对，这信要是被人找出来，会要我的命了，就给销毁了。

我们那时更多地不是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自己受到的迫害，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生活在一个草根阶层的环境里，但还是有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你到了这个环境中来，周围的牧民很朴实，那种朴实的劳动者形象，就会对你产生影响。有的牧民还真聪明，也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捅咕捅咕就修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也能修车，现在想起来都挺怀念他们的。后来，有些蒙族牧民到北京玩或者看病，来了就住到我们知青家里，我们都会陪他们玩，联系医院。

我后来回过牧区两次，其中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回去的。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队的山上，放眼看去，那草原跟海一样无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马在山上吃草。我女儿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环境里生活有关系。不像那种人挤人、人斗人的，互相没距离的环境。确实，辽阔的草原陶冶人的心境，使人变得包容、开放。

## ◇ 生活轨迹的改变

大概是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从1968年底到1972年5月，插队的时间已近四年，那时已有不少知青返城了。可能是内蒙的知青少，地方大，国家给的招生名额就少一些。我们几个知青当时在北京，听说招生的来了，赶紧从北京往回返。第一批是外语学院，要二十一岁以下的年轻人，说我们都超龄了，我们挺失望的。接着，第二批来了，我一看，学校太差，专业也太偏。我想，学校差点，那就找个通用的专业吧。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是学通用机械，而且属于一机部管。于是，我选择去那里了。后来，旁边的一个地区的生员不够，听说我们这批知青都是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就跑过来了。招生老师问我，北大地球物理系，你愿不愿意去？我说好啊。他就当场定下要我。后来，山西招生的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都答应我了。而且，我也给领导汇报了，你要是变卦，我交待不了。那时候人都特老实，觉得答应人家在先，那就还是去山西矿业学院吧。何况我当时还是背着点小问题走的，人家招生时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于是，我去了山西矿业学院。路书奇调到自治区外办，冯江华去了吉林化工学院，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到了长春地质学院，狄阜平去了西安交大，只有李三友没走成。

我老家在山西孝义，跟山西还是有缘。我到山西一看，觉得真是落后，干部素质挺低，学生也不怎么可爱。不像内蒙，有大草原，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纯真，相形之下有时非常怀念内蒙。当时因为很多学生没有高中学历，入学先补习半年的高中课程，我提出来不去上课，直接参加考试。那老师好像被我唬住了，一想，我是北京高三的学生，也就同意了。

我当时认为：要把数学、外语学好，这两门课是基础和工具。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把高等数学自修完了。我觉得自学和讲课还是不一样的，我选了好几种教材：有同济大学樊映川的读本、有哈军工苏联斯米尔德洛夫的教材，还有清华大学新出的教材。我稍微比较了一下，还是清华的好。清华教材薄，在你不易懂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易懂的地方就不罗嗦了。剩下的那几本则相反，在易懂的地方反复讲，不易懂的地方一带而过。要不仔细对照阅读，不会发现这问题。另外，我要学英语。我问我爸爸，在太原能不能找个能教外语的人？他说，嗨，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专业不算一流，据说英语很好。他是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外语的国际关系学院沈葆青教授的哥哥，叫沈葆诚。他是1949年去美国的，在美获化学博士学位，1959年回国时是我爸爸跟他谈的话，把他分配到了太原燃化所。我就拜他为师，找了一本专为外国学生编写的英语教材（《Essential English——special for foreign student》），我觉得那教材就是放在现在也还是一本很成功的教材。沈老师完全用聊天的方式教我，这样，他把我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了。每到周末，我都跑到他家里去学。他的太太、小孩都不在太原，他自己一间房子，弄个电炉子做饭。他是苏州人，爱吃，讲完课后，他就带我下饭馆。我一直跟他学，混了有二年多的时间，给英语打下了基础。

我到山西时想法已经比较务实了，那就是要读书，毕业以后要工作。我们上高中时候，向往的都是学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搞原子弹、自动化啊，机械系谁上呀？认为机械系不是最好的学生上的，只是容易考。当我们接触实际以后，才慢慢知道，机械工程是通用的，将来找工作或再学点别的知识，都是个很好的基础。

那时候，我跟育才的同学还一直都有联系。育才的同学都比较单纯、老实。我上大学后一直跟初中的女同学通信，但信里谈的都是学习心得，也没有谈其它什么。我们那时候20多岁了，在当时的环境中青春的萌动也来得迟。只是有点朦胧的感觉，好像跟她通信有种特别的感觉和动力。后来好像没有什么过程，恋爱阶段就结束了。

当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年，华国锋搞了“洋跃进”，燃化部进口许多设备，需要懂外语的工

程师。于是，就到我们学校里招学工科的去培训外语。我被招上了，集中到北京学外语。当时因为可以解决进北京户口，请的老师也都很好。实行听、说领先的口语化教学，以应对将来跟外国专家打交道。集训了大概一年半，每天就是听啊、说啊，老是在练习。等我出来的时候，燃化部已经分成好几个部了，我1976年被分到煤炭部。

#### ◇ 转折的年代

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没有哇哇地哭，但心里总觉得总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四·五”事件时，我也到天安门广场去了。那时候去天安门的人真不少，大家都很激动。广场上的花那么多，越堆越高，而且，还有不少人在广场上发表演讲。每个人都在议论、思考。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想到今后的国家命运，不只是悲痛，还有理性。

那时，毛主席开始还批评四人帮、江青，后来他找毛远新传的那些话，都是批评邓小平的。我当时看到邓小平带来的希望又让他给打下去了，就跟我爸爸说，毛主席会用江青。我爸爸说不会。这表明我当时对毛已失去了希望，没信心了。毛主席去世是件大事，可我没有感到悲痛，当然也不是幸灾乐祸，但内心总有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那种感觉，觉得他再这么搞下去是不行的。

四人帮的倒台，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四人帮被抓，我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是徐文连（徐海东之子）跑到我家告诉我的。我立刻跟我的家人说，我们全家都激动得不行。我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11月14号早晨，我坐在汽车里，听到播送为“四·五”运动平反的社论。（4）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了。那文章说得特别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很解气，语气不是很张扬的，但讲道理，有很强的穿透力。

到煤炭部工作后，我连续四次去国外考察。1978年出国，坐大轿车，车里边有厕所、有办公桌。我们坐着这辆车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全部绕了一圈，看得很细。代表团的任務就是引进设备、考察技术，我给领导当翻译，口译还能应付。当时出国的人还不多，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着我，让我讲国外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国外的一份报纸，有几十页或上百页之多。他们不能理解，报纸怎么这么厚啊？我出国后，发现人家物质那么丰富，包括罗马尼亚，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先进得多。咱们驻外使馆的人说，国内外的差别太大了，咱们是开始建设现代化，人家已经是在享受现代化了。

#### ◇ 欲穷千里目

1978年开始恢复招研究生了。当时我还在煤炭部工作，没考。1979年又招第二届研究生，孔丹、马凯都考上了，我又没考。到了1980年，我说，我不能老是顶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我得去上个学。于是，我就要求请假。当时我是部里的业务骨干，而且正在筹备一个国际会议，当时的煤炭部副部长是贺秉章，他知道我，因为我们管出国考察、国际会议这些事，所以，他经常把我们叫过去汇报。他先是不允许我请假。我说，那我就请短点，只请一个月或者二十天，他经不住我磨，就批准了。

我是1980年入校，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制两年半。（下略）

#### ◇ 关注经济改革

我是通过刘进认识金观涛的。在内蒙古插队的时候，刘进曾经到贵州看望她的姐姐刘青峰和姐夫金观涛。那时，刘青峰写了《公开的情书》，刘进当时一字字地抄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带

了回来。我们就传看那个手抄本，我们称之为“小红书”。就这样，我们也知道了金观涛。

《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两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但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巨大震动的。这本书我是在草原上看的，旁边牛在嚼着草，书中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一种新的思维。

我们都回到北京以后，跟金观涛见面了。刚开始谈的时候，谈不拢。金观涛好像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没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不能接受，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经常跟他辩论。那时孔丹在读研究生，他想学方法论。当年控制论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金观涛就给我们讲控制论。控制论是自然科学方法论。金观涛试图用控制论来解释和揭示社会现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用黑板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包括信息、可能性空间、黑箱、自组织系统、稳态什么的。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变成了朋友。后来，金观涛从贵州到北京来参加自然辩证法杂志召开的会议。我就跟我爸爸说，他希望能调到北京来。我爸爸把金观涛介绍给许良英，他把金要下来，调到北京。

八十年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触及经济体制问题，我的兴趣和关注也由所从事的职业工作转向经济体制改革。我参加了一些讨论，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和研究报告。当时刘国光编了一套书，是把当时各个领域改革，比如财政、税收、投资的那些论文集中起来，写了个总序言。这些书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当时改革的主要前沿思想就了解了，但是现在看，那时候对市场体制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 ◇ 反思文革

今天回首文革，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认为是一个纯真的、充满理想的时代。但从现在的认识看，那是一个幼稚的、非理性的、疯狂的时代。其实我对文革、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在1966年年底就开始了，我们后来接触海淀区的一些老红卫兵们，他们始终认为红卫兵的那段时期是他们最光辉的时期，他们的思想怎么停留在那个历史点上了呢？虽然当时也很纯真、很激情，然而却是中国的悲剧。

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 and 追求。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能为实践所证实，经列宁、斯大林又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现在再重新认识这场灾难，愈感文革的产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而且由来已久，根子很深。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文革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我们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对上述问题，当时一些中央的领导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

翦伯赞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生都是跟共产党走的。解放后，把翦伯赞派到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根本就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当时把北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他的“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他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文革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法国大革命中，左派被更左派的杀了，激进主义也是到了极致。但法国彻底反省了激进主义，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咱们还停留在邓小平、胡耀邦做的那些事情上。所以，一帮朋友聊天说给父亲写传什么的，我想如果停留在革命、理想、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识上，而没有对这段历史的更深刻的反思，这种传记经不起后人的质疑和追问。文革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象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至于红卫兵的经历给我留下来什么，我觉得，就是被打到最底层后的反思。我首先要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思想是比较幼稚的，可能跟别人比，还没那么疯，但也是头脑发热。如果说还有些理智，但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所以，首先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但我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是有抵制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也是难以理解，甚至是怀疑的，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了迫害。怎么把握这两个方面呢？我认为有这么三个阶段。

整党时，每个人都要准备讲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我这“三阶段论”在文革后整党中成为好多人的范本，全来抄我这个三阶段论。

第一个阶段——“阶级斗争”，这是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那正是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对阶级斗争的理念印象比较深，也无保留地接受了“阶级斗争”观点。第二个阶段是文化革命，提出了“走资派”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继续，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第二阶段，我一开始是有保留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怀疑和抵制。因为这样做实质上是颠覆了我们长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也无法接受父辈是反党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到后来的第三阶段，就变成四人帮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了，对这个我是持反对和反抗态度的，也为此蒙受打击、迫害。



## ◇ 两次大惑，走出乌托邦

文革的大背景，跟我们后进国家的激进主义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激进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或政治意识形态，什么叫叙事，叙事就是“前科学”。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定是乌托邦。它崇尚的是卢梭的“积极自由”即“己所欲，务施于人”；而不是洛克的“消极自由”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必须跟我走，否则你就违背历史潮流，你就是异己或敌人。这就把核心的价值给颠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异化的结果。

毛泽东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了民族国家。孙中山没有成功，蒋介石也没有成功，毛泽东成功了，这是历史要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个，他不管是用土改、合作化、集体化还是国有化的方法，比较快、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动荡问题。中国100多年来，谁能解决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保障？毛泽东做到了。但从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处理方式还是取得的成果，都存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对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没有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他在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又把它推到极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又造成更大的问题。60年代初3000多万人饿死，这事发生在20世纪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又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今天都是不可设想的，怎么向历史交待啊？反右、文化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等，这就不用说了，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现代价值观。

我自己一生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直到林彪事件出来了，对主席有了新的认识，慢慢把这个“惑”破了。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了：不对啊，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这第二次大惑就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毛泽东那一代人是致力于改变中国面貌的，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就举起了这个旗帜。但他从不死照着那个本本来做，怎么实用怎么来；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对马克思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很容易走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上面去了。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我一直试图给激进主义下个定义。我们过去理解激进主义，是指它暴力或者革命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激进主义的实质或者说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在于它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经验和传统是经过千百人、千百年实践、思考而形成的，这中间也需要思想家、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和倡导，也会发生革命和动荡，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演进的过程。这就是洛克倡导的“自然法则”，也是苏格兰启蒙和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和经验。而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近代的产物，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走向异化。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最根本

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终结。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告别了列宁—斯大林模式，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重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但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我们在国内不讲阶级斗争为纲了，提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但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认识仍未能真正摆脱阶级属性。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贪污、精神与道德的缺失、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其根源就是没有真正实现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建立。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现实，但如果赋予它特定的含义，将之与启蒙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起来，拒绝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以国家利益之名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以阶级属性来解构普世价值中的“真、善、美”，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 ◇ 步入政界

我在煤炭部工作了大概有7年时间，中间有2年半脱产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煤炭部，没多久就任命我为副处长。1983年宋任穷的秘书刘泽彭要调到中组部工作，需要有人代替。宋老家我虽然常去，但和宋老并不认识，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我。

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下略）

我在工作中很严谨，在工作外为人处事比较随和，宋也了解我的性格。我有事会直说，当然也会有分寸。给宋任穷当秘书，使我对老一代革命家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对高层决策的产生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有很大帮助。那些朋友们也没人把我这个宋任穷的秘书当回事，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神秘的。建第三梯队是1984年提出来的。虽然我列不到名单上，但还是在他们的视野里。我知道我曾经先后被考虑过担任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安全部副部长，第三梯队的人选主要还是注重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当时提出来，不能选文革中既得利益者，特别要警惕“三种人”。事实上，文革那样大的运动，卷进去的人是非常多的。现在回过头看，在特定的环境下，人都有可能是非理性的，除去极个别有刑事问题的，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实际上也追究不了，反而成为负担。中国遗留的一些政治问题也会朝这个方向走，政治解决加上民众的认同。国际上的一些历史纠纷，有的是全民公决解决的，有的是政治解决的，也有的是法律解决的。咱们国家打不了什么官司，寻求政治和解是最好的途径。

#### ◇ 适合自己的位置

我在宋老那里做了约两年的秘书后，就离开了。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唐克要我去。宋老是管干部的，对我的使用和以后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看法。1984年我陪他去四川调研，在三峡船上碰到几个外国人，就聊了起来。事后他问我，你会英语？我说还能凑合着用，他想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你应该从事更适合你的工作。离开宋老还有一个考虑，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一方面社会上民众对重用高干子弟有看法，或者说有偏见，比如陈

元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差额选举中就落选了。另一方面，新的领导上来后也不愿意用太多前朝元老子弟，因为一是不好领导，二是这些人关系太多，互相传话。

所以我认为高干子弟不要非挤进官场里去，就在自己的领域里把事情做好，然后关心点国家的事。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就是说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当然，对我个人来讲，后来很晚的时候了，还是有些机会进官场的，包括朱老板（朱容基）也曾经考虑让我当人民银行副行长，那是王岐山推荐的。

尽管我也在体制内工作过，但真要我去做领导工作，恐怕也很难适应当下官场的规则、语言和决策方式。进官场的人在体制内呆时间长了，很多观点已经不能和你很透彻地讨论了，因为会涉及到很敏感的问题。官太高了，能谈多深？有一位领导是我的学长，挺爱看我写的文章，说秦晓的贡献就是能写文章。一次他见到我说，秦晓，你写的文章怎么不给我看了？我说，我写的文章不太入流，我也不愿意打搅你。他说，我都看了，思想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他实际上是认同不同观点讨论问题的，不是非得一个声音，但是他的表述却很谨慎。现在，谁还讲思想无禁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信仰和认识的不同。信仰是对宗教而言的，认识是对科学而言的。如果是宗教，你就不能去探讨有上帝没有？信仰是不能怀疑的。认识呢，是你必须问几个为什么，必须有怀疑精神。现在说要信仰一种思想，那不跟宗教一样了嘛？宗教还有个自愿的问题呢。

#### ◇ 进入商界

我1985年到了石油部，任国际司副司长。当时石油部是一个重要的部门，也是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我做了一段，大家反映还不错，部里把我作为副部长的后备干部报到中组部，我离开前还调我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不过，我1986年去了中信。当时王军要我过去，石油部一开始不放，说要提我当副部长。后来唐克先到了中信，经他出面做工作就把我放了。后来，王军还跟荣毅仁说，秦晓是放弃石油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信来的。王军是中信的元老，那时他官不大，是业务部的第一把手，他也不是非要当多大的官，但他管的地方他要说了算。他在中信是特殊人物，荣毅仁也要让他三分。当时给他配的都是从政府部门来的干部，对企业什么都不懂，他就什么事都自己决定。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他就想找个人帮他。经孔丹推荐，他就把我去了去做第一副总。

（下略）

#### ◇ 与金德琴的一场斗争（略）

#### ◇ 关于中信泰富（略）

#### ◇ 接手百年老店

从1986年到2001年，我在中信呆了近十五个年头。我于2001年1月初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中央正式文件是2000年12月底下发的）。大概是在我当中信副董事长半年左右的时间，一次我从国外回来，刚下飞机就接到调任的文件，并说曾庆红要见我。我就跑去见他，庆红说：你的工作我一直放在心上，调你去招商局我是先征得了朱容基总理、吴邦国、吴仪副总理的同意才上会的。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

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到招商局任董事长，对我来讲是一次角色的转换，要主导全面工作，承担起责任、做好班长。同时要学会当董事长，不做总经理该做的事。但是，我经常会不留神就钻进去了。所以，我们总经理有句话，说秦董有时候比我们还细。我也不知道这话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下略）

◇ 招商局再造（略）

◇ 第三次辉煌（略）

◇ 关于国企（略）

◇ 学术研究

我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工作比较单一。我觉得应该系统补补经济学的课。之前，我没有系统地读过微观经济学。其实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只是在凯恩斯以后才有了宏观。我就把微观经济学读了一遍，后来又接触到“新制度经济学”，之后我就开始读博士。系统读经济学理论使我对市场经济，政府职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发现政府的职能成为了一个问题。八十年代改革达成的共识是市场转轨，不过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体制。为什么形成这种共识呢，是因为先学东欧，什么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那些东西很快就不够了，因为他们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的改革。接着学欧美，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市场机制的鼻祖在欧美。可是，找来找去，和中国最接近的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个跟我们当年的体制有关，这样比较容易在更大的层面被接受。而且大家认为启动市场化转轨也需要政府扶持。《大公司战略》的文章是我1990年代初写的，那就是比较典型的青瓦台和通产省的模式。在那前后读的书也都是这方面的书。我的第一本书《制度变迁中的实践与思考》是林毅夫写的序，林毅夫对其中每篇文章都看得挺细。他写序的时候跟我讨论，感觉我的思想前后有变化，因为他对我早期的观点不太赞同。我说，你说得很准确，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我相信“新权威主义”、“发展主义政府”这套理论。当时“东亚模式”比较流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不仅对美国、欧洲造成冲击，也挑战了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我都认真读过。那时，我还跟吴敬琏老师争论过，后来我才转过来。林毅夫提出这个问题后，我就插写了一段注，说明思想是怎么转过来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产权问题前面谈到了一些，目前还没有捅开。我是一方面系统学习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就形成现在的认识了。后来写的很多文章，完全是针对政府功能写的。

我到了招商局以后，写了不少东西。其中，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也都是我自己写。讲话就要言之有物，就要对现象、问题有认识、有想法。所以每次讲话以前我要做调研，翻阅资料，当然更主要的是平时的观察和思考。总之，这些讲话我是下了些功夫的。据我的了解，在国企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公司编了我的三本书：《秦晓论》、《秦晓谈》、《秦晓讲》。这几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我在招商局十年工作、学习、研究的历程和成果。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秦晓集》，共五本。“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企业基业长青之路”主要收集的是在公司内部的讲话（分上、下两册）和媒体的专访；“市场化进程：政府与企业”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论文；“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关于现代大型公司总部功能的研究”是我在剑桥的博士论文中文版（英文版已在英国出版）；“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论文。

#### ◇ 现代化不能代替现代性

在中国，“现代化”讲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它抽离了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只是物质和经济增长。所以，中国话语中和场景中的现代化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不是一回事。

“现代性”的问题不是“民富国强”，而是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现代化”是不能代替“现代性”的。在中国，现代制度、价值体系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推翻了帝制以后，建立了共和，但又一步步走向集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邓小平解决了市场机制的转轨和对外开放，今天的经济成长跟邓小平的决策是连在一起的。他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做了勇敢的突破，但未能真正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经济上强大了，变成世界大国了，但矛盾、问题暴露得更多了。

胡锦涛倡导“以人为本”，这应该说是个进步。但是，有两个问题要落实：第一，“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人，是每个人的权利。第二，要有一套制度来保证这个权利。

“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精英中并未形成共识，许多人仍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按阶级属性来区分社会形态，把现代性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这是我很忧虑、很担心的。这些精英实际上对欧美近代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观念、制度、社会的变革不了解，也没有结合中国的近代史、现实状况做深刻的思考。世界近代史就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它起源于欧洲，以后扩展到北美。中国的近代史和其它传统社会国家的近代史，都是围绕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课题的历史。所以，要站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高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史，而不能总是陷在几千年中国帝制王朝中去看世界、看欧洲。如果我们的精英不了解欧洲史，也就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把太平天国、义和团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就脱离了历史的脉络。

我最早是从经济领域中认识“现代性”的，比如强势政府的问题，认为这是计划体制留下的问题，后来觉得还是跟政治体制有关的。再想，这个政治体制的后面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

谈“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系，我觉得是切入口。一讲这点，大家都觉得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商界、政界和学界的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关注的，实际许多体制内的精英也是认同的。

“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它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或者说，只要不违反法律，我可以不做你强迫我做的事。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实是普世的，没有阶级的属性，只有文化偏好。这种差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二元张力结构中均衡点的不同，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把起源于启蒙价值的现代价值称为一个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组二元对应的结构，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家庭、集体和国家利益，理性—理想等。我觉得在中国建立现代价值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纲常秩序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对皇上来说你是臣民，对你儿子来说你是父亲，对老婆来说你是丈夫。那你谁？把这些对应面都除掉，没你了。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义这个词还是负面的词，自由主义也是负面的词，认为个人主义是损公利己，认为自由主义没集体观念，如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前缀，问题就更大了。

新儒学认为儒学不仅可以产生现代化，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我很难认同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现代性转型中应认真吸取其中资源，特别是儒学中的“内圣”部分，但作为文明秩序或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即“外王”，它剥夺人们的权利、限制人们的自由、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这与现代社会的理念和制度是不相融的。在汉朝以后它已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就是造就顺民，维护皇权的专制。

#### ◇ 把学习、思考、探索继续下去

要实现社会转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体制内的精英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理念出发，或者是从利益出发，他们主动改革。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现在有 internet 网，有各种传媒，有很多受众体，基本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早上起来全都知道了。这种高速度的、大面积的、深度的信息沟通，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一旦大家有了共同的真善美标准，共同的追求，对某些问题有了共同的认识，这些共识如果积累到一个阶段的话，就会触动体制内的精英去改革。邓小平说过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这个问题当今依然存在。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说的危机。不管是因为经济上出了问题，还是外交上出了问题，还是因为例如像 SARS 这样灾难性的偶然事件，一下子把问题激发出来了，这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的。

我们这代人有文革和改革开放两次大的反思，我说我有两次大感嘛。反思留下科学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有经历，参与了走出乌托邦的社会变迁。我想，我们这代人首先应该把中国的问题破题，然后在精英范围内去讨论。移风易俗，开启民智，而不能太功利、急于求成，也不要对出现开明君主有过多的期

待。激进的思想和做法是有代价的，启蒙也是长期的，破题、扩大共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担当起来的使命。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和何迪组建了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机构——博源基金会，吸收了许多学者、企业家和从政界退下来的精英，通过学习、讨论、专题研究来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博源成立不到三年，在学界、商界、政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期间，我连续写了六、七篇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它记录了我学习、思考的路径。我想，这个认识和体验仅仅是个开始。我今年63岁，已到退休年龄，有时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戏称自己是“60后”的一代，其实是在唤醒、鼓励自己保持活力。因为我知道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学习、思考、探索还要坚持下去。

注释：

（1）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3）《联动宣言》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4）编者注：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思语（美国）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